

聂会东与齐鲁医学教育的发端(1883-1911)

刘家峰 叶大深

摘要:聂会东于1883年来华后治病救人、培养医生,在山东工作、生活了近40年。他坚持中文教学,与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合作,开医学巡回教学模式之先河,并在多年实践基础上建立了系统、正规的现代医学教育体系,在中文教科书编写、医学名词术语统一等领域均有重要贡献。作为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齐鲁医院的创始人,聂会东为齐鲁医学享誉中外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聂会东;医学教育;齐鲁大学;齐鲁医学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1.04.019

聂会东(James Boyd Neal, 1855-1925),美国北长老会医学传教士,1883年来华,先后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和济南从事教育、医疗工作,曾担任文会馆教师(1883-1890)、济南文璧医院院长(1893-1908)、中华博医会主席(1903-1905)、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1908-1919)、齐鲁大学校长(1919-1921)等职。1922年因病回到美国,1925年病逝于费城。他是今天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齐鲁医院的创始人,也是山东现代医学教育的主要奠基者^①。因此学者们在探究中国早期现代医学教育和齐鲁大学时都会提及聂会东^②,但部分论著涉及其生平事迹时往往语焉不详,甚至有以讹传讹之处等,对他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更是极少。本文拟利用近些年收集的美北长老会及齐鲁大学档案、期刊材料,重点考察聂会东来华至1911年医道学堂落成这一时期的医疗与教育工作,探讨他如何一步步夯实山东现代医学教育的基础,解析齐鲁大学医学院何以超越历史更久、名声更大的文理学院(文会馆),铸就中外闻名的“齐鲁医学”。

一、登州时期:医疗服务与医学教育的萌芽

1855年5月8日,聂会东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布鲁斯伯格镇(Bloomsburg)。他的父亲威廉·尼尔(William Neal)是一名钢铁商人,同时担任当地一所师范学校的董事会主席;母亲玛丽·博伊德(Mary Lavinia Boyd)是威廉的第二任妻子,聂会东的中间名Boyd就来自母亲的姓氏。聂氏家族均信奉新教,是美国长老会会友。来华传教士一般都要给自己起一个雅致的汉名,有人说聂会东这个中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齐鲁大学史研究(1864-1952)”(15CLSJ07);山东大学“考古与历史学学科高峰计划建设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刘家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济南250100;jfliu@sdu.edu.cn);叶大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济南250100;358997371@qq.com)。

① 关于聂会东的基本情况,可参考吕军、曹英娟编译的《聂会东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9年)。该书收录了聂会东的论文、工作报告、书信及他人纪念聂会东的文章,共计25篇,以中英文对照形式出版,这是国内外首次出版的聂会东文集,对聂氏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② 相关著述有马伯英、高晞、洪中立:《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张大庆:《早期医学名词统一工作:博医会的努力和影响》,《中华医史杂志》1994年第1期;郭查理:《齐鲁大学》,陶飞亚、鲁娜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彭益军:《齐鲁大学与近代山东医学教育》,《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李传斌:《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1835-1937)》,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徐保安:《教会大学与民族主义——以齐鲁大学学生群体为中心(1864-1937)》,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郭大松:《齐鲁大学文理医三学院渊源及英中文名称考》,《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叶大深:《齐鲁大学早期医学教育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文名字有“中西医学相会”之意^①,但其真正含义目前尚不可考。

1873年聂会东考入耶鲁大学哲学与文学系,1877年毕业后进入谢菲尔德科技学院医预科;1880年考入当时全美最负盛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1883年5月毕业。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创办于1765年,是美国第一所有资格授予医学学位的高校,创始人约翰·摩根(John Morgan)希望毕业生成为当地医学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并将宾大医学院的声誉传播到世界各地^②。据宾大官网^③介绍,第一位来华的医学毕业生是1823届的布莱福(James Bradford)^④;第二位是1840届毕业生麦嘉缔(Divie B. McCartee, 1820-1900),1844年来华(宁波)^⑤;第三位就是1883届的毕业生聂会东。

聂氏来华前的美国大学校园正弥漫着浓烈的宗教奋兴情绪,许多大学生希望毕业后去海外传教。在这种情绪感染下,有着深厚宗教背景和情怀的聂会东,立志成为医学传教士,并得到北长老会海外布道会的支持。1883年10月,他携新婚妻子踏上开往中国的航船,于11月15日抵达上海^⑥。停留一周后继续北上芝罘(今烟台),夫妻二人再改为骑乘,在寒冷、泥泞的道路上颠簸了近90公里,终于在11月27日抵达登州^⑦。他们最初住在文会馆创始人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1836-1908)夫妇家中,后于1884年春搬至城东梅理士(Charles R. Mills, 1829-1895)的住处^⑧。

此时,狄考文、梅理士等人于登州府从事传教工作已近20年。在他们的苦心经营下,传教和教育领域已有很大成绩,特别是高等教育,狄氏创办的登州文会馆在1884年被长老会总部正式批准升格为大学。遗憾的是,20年中教会的医疗服务和医学教育乏善可陈。麦嘉缔虽在1862年7月就从宁波迁往芝罘,试图以家为中心开展医疗和布道工作,但他工作不足三年便返回了宁波^⑨。可以说,登州地区缺医少药,根本无法开展医疗工作,甚至连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传教士患病也难以得到及时医治。直到1878年,北长老会派遣克利斯医生(A.D.H.Kelsey, 1844-1931)赴登州开设诊所,医学工作才真正起步。

1882年,克氏由于健康问题迁居日本^⑩,教会医疗事业又一次陷入困境。因此,1883年底聂会东的到来,让登州差会又看到了希望,他们在年度报告中使用了“备受鼓舞”“颇为珍贵”等词汇真诚表达了对聂氏的欢迎^⑪。与所有来华不久的传教士一样,聂氏夫妇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学习语言。1884年,聂会东在写给总部的信中表示,除非遇到较为严重的患者,他尽量避免行医,一些轻微病症主要由狄考文夫人狄邦就烈(Julia Brown Mateer, 1838-1898)诊治^⑫。长老会差会1883、1884年度的工作报告均没有提及登州的医学活动,可见聂氏尚未将精力完全投入医疗工作中。

聂会东正式管理诊所始于1885年1月1日。该诊所由克利斯开办,位于登州府城东门附近的东大寺,距离主干道有一段距离。聂氏认为其位置太过偏僻,便把诊所转移至紧邻街道的一所教堂里。

① 马振友等:《齐鲁西医及皮肤性病传播者聂会东》,《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2014年第6期。

② Kaiyi Chen, *Seeds From the West: St. John's Medical School, Shanghai, 1880-1952*, Chicago: Imprint Publications, 2001, p.57.

③ <https://global.upenn.edu/global-initiatives/history-penn-china>, 访问日期:2021年3月15日。

④ 1828-1835年,布莱福曾在广州参与英国人郭雷枢(Thomas R. Colledge)主持的广州诊所。苏精:《西医来华十记》,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41页。

⑤ 麦嘉缔1844年到宁波后开办诊所,1864年曾到山东芝罘传教但并不成功。齐鲁大学奚尔恩曾评论说,麦嘉缔是“一个非常有趣、多才多艺的人,对在中国和日本的宣教事业做出很多贡献”。John J. Heeren, *On the Shantung Front*, New York: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40, pp.218-219.

⑥ “Missionary News”, *The Chinese Recorder*, 1883, 14(6), p.498.

⑦ James B. Neal to the Board, Dec.3rd, 1883,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Correspondence and Reports: China 1837 to 1911, Incoming, China Letters, 1883,17, No.159. 该档案保存在费城长老会历史档案馆,以下引用简称为BFCR,只标注日期和卷期号。

⑧ James B. Neal to the Board, Apr.4th, BFCR, 1884,18, No.141.

⑨ John J. Heeren, *On the Shantung Front*, pp.218-219; 另见郭查理:《齐鲁大学》,第44页。

⑩ Hunter Corbett, *A Record of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Work in Shantung (1861-1913)*, Second Edition, 1913, p.17.

⑪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1884, p.106.

⑫ James B. Neal to the Board, April 4th, BFCR, 1884, 18, No.141.

他对教堂的主体建筑进行了小规模扩展,新辟出一个储药室,同时移除建筑内部的一堵隔断墙,加大了候诊室的空间。旧诊所用以接收住院病人^①。病房起初仅放置了15张病床,之后陆续增添,以尽可能容纳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值得说明的是,诊所与医院的改造款项并非由差会出资,而是来自长老会拨给聂氏个人的生活费用^②。由此可知,所谓“聂会东1883年在登州开设诊所”^③一说并不准确。首先,聂会东来华是在1883年底,第二年以中文学习为主,每天4-5个小时,空闲时间在文会馆与女子学校从事一些教学工作,除非特别必要,几乎不涉足医疗活动^④。因此,长老会报告中有关医学工作的记录随克利斯离开而消失,直至1885年。其次,聂氏也非创设诊所,而是将原有诊所扩展为一家小规模医院。也有材料称,克氏1878年所办即是医院^⑤。一般说来,构成医院最基本的条件之一是拥有病房和一定数量的病床,但在聂氏来华之前,该诊所并不具备这些设施,其年度报告描述医疗场所的词汇为dispensary(诊所、药房),而不是hospital(医院)。聂会东写给总部的信中更是明确提到,旧有诊所(药房)没有收治住院病人的条件。自1885年起,登州差会工作报告中才开始使用hospital一词。就此而言,长老会在登州乃至整个山东的第一家医院应是1885年由聂氏改造旧诊所而成。

作为一名医学传教士,通过治病施药直接或间接向病人传播福音是应有之义。聂会东在1885年给差会的信中写道:“此刻,我最感兴趣的工作是通过诊所接触这个地区的人们,如果诊所与医院的活动能给这里的人带去真理,并引领他们真正信仰我们的救世主,那我将无比开心。”^⑥简言之,聂会东迫切希望透过教会的医疗空间直接向患者宣教。差会和他本人均对这种方式寄予厚望。诚然,改造后的诊所在当年244天的营业中接诊4020人次,平均每天16人次以上;另有15人住院治疗^⑦。1886年,门诊3474人次,其中1629人是新病例,男性1362人,女性267人,住院患者41例,外科手术134例^⑧;1887年,门诊数为3500人次,其中1620宗新病例^⑨。通过诊所接触的人尽管比以前多,但传教效果却并不理想。1887年,聂氏在第三次年度报告中写道:“这几年来,人们对宗教还是无动于衷……每当我们谈到基督教义时,中国人总是把话题岔开,很少有人对物质之上的东西感兴趣,他们的生活完全被如何解决温饱所占据”。“在与住院病人的交谈中,我不止一次感到失望”^⑩。

向病人传教的挫败感,让聂会东重新思考来华的目标绝非仅仅是借医传教,更重要的是培养本地医生。1890年5月,聂氏在中华博医会大会演讲时表示,自己来华之前就对培养本地医生感兴趣;正因如此,他才被长老会邀请派往山东^⑪。但考虑到彼时登州传教站尚无一所设施完备的医院,缺乏实习场所,加之聂氏来华不久,汉语并不熟练,难以教授复杂的医学知识,因此准备工作长达3年之久。

1887年,登州教会在医学教育领域终于迈出了重要一步。年初,聂会东正式开设医学班,招收了5位年轻人。教会为每一名学生提供1500文铜钱的资助,用于日常开销与学习资料的购买。学生入学时要签署一份保证书,确保自己能够完成为期3年的课程,并承诺在此期间不准行医,除非得到特

① 东大寺和寺后的姑子庵等处是长老会传教士的居所。东大寺寺前是一条贯通县城东西的主路,据聂会东的描述,我们认为诊所原本很可能位于姑子庵,临近街道的建筑是教堂,聂氏决定将其扩充改建为医疗之用。

② James B. Neal to the Board, Dec.1st, BFCR, 1885, 19, No.48.

③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卫生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1页。

④ James B. Neal to the Board, April 4th, BFCR, 1884, 18, No.141.

⑤ 连警斋编:《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上海:上海广学会,1940年,第179页。

⑥ James B. Neal to the Board, Dec.1st, BFCR, 1885, 19, No.48.

⑦ “Several Reports of Medical Reports,” *The Chinese Recorder*, 1886, 17(6), p.238.

⑧ “Hospital Reports for 1886,”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87, 1(1), p.39.

⑨ “Hospital Reports,”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88, 2(1), p.32.

⑩ “Hospital Reports,”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88, 2(1), p.32.

⑪ Jas. B. Neal, “Training of Medical Students and Their Prospects of Success,”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90, 4(2), pp.129-130.

别批准^①。凭借一具带关节的骨架、一些头骨和松散的骨骼,以及一副与真人大小相同的人体模型,聂氏已能教授解剖学^②。科目安排如下:一年半的解剖学、生理学、化学课程;通过考试后,再研习嘉约翰(John G. Kerr, 1824-1901)的《西医内科全书》和外科学。逐步参与临床实践,主要是对病人医检,包括叩诊、听诊;同时还须阅读炎症、皮肤病、梅毒、治疗学、产科学等方面的书籍^③。学科设置重视基础,较为全面。

过往传教士医生为方便工作,总要雇一位中国助手,而助手“见习既久,亦能行医……自设药肆卖药,以西法治病,利市三倍”^④。聂会东试图改变这样的师徒制度,他要培养正规的现代医生而非卖药郎中。无论是设立三年学制还是不许私下行医的规定,抑或相关科目的考核,均体现出聂氏开展系统医学教育的决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聂氏在登州的医学班称得上山东现代医学教育的萌芽。长老会报告中对这个群体的称呼也由 assistant(助手)变为 student(学生)。有研究认为,聂氏不经课堂而直接通过临床案例进行教学^⑤,此说法是不确切的。

医学班的开启让聂会东感到这是“目前为止在登州府最有趣、最令人愉快的工作”^⑥。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他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医学生培养方案。1890年,中华博医会在上海举行第一届大会,聂氏发表了《论医学生培养及其前景》的演讲,与同行分享经验心得,也为未来的工作方向提出设想(内容详后)。此时的聂会东,渴望一个更大的舞台施展抱负。他把目标锁定山东省会济南,并很快得偿所愿^⑦。

二、济南时期:从巡回班到医学院

1871年,美国传教士文璧(Jasper S. McIlvaine, 1844-1881)创设长老会济南布道站。1879年,洪士提反(Stephen A. Hunter, 1851-1923)开启济南差会的医学工作,其医疗服务有效弥合了教会与当地民众的矛盾^⑧。1881年,文璧经过多年努力,在济南城内西大街以3700两白银(约5000鹰洋)的价格买下一块土地拟建教堂和医院,却由此引发一场教案^⑨,最终在美国公使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 1844-1912)干预下才得以化解。教会获取一小块地开办诊所^⑩,设在官署附近,规模较小,加之洪士提反1885年被调至芝罘^⑪,诊所起步并不顺利。同年,长老会派遣满乐道(Robert Coltman, 1862-1931)医生到济南。在他掌管下,医疗工作有所起色,诊所门诊病人最多一年近8500人,是同时期登州门诊人数的两倍^⑫。1890年,聂会东与满氏对调。这时,济南差会仍在积极筹办一家正规医院。最终,经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 1857-1927)多方奔走,教会购得城市东郊一块土地。医院修建工作始于1891年秋^⑬,款项主要来自文璧的遗产,因此命名文璧医院。聂会东1891年11月

① “Hospital Reports”,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88, 2(1), p.34.

② “Hospital Reports”,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88, 2(1), p.34.

③ Jas. B. Neal, “A Year’s Medical Work in Tungchowfu”,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89, 3(1), pp.32-33.

④ 连警斋编:《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第179页。

⑤ William M. Decker, *The Foundation and Growth of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1864-1917)*, Master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1948, pp.42-43.

⑥ “Hospital Reports”,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88, 2(1), p.34.

⑦ Hunter Corbett, *A Record of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Work in Shantung (1861-1913)*, p.17.

⑧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1881, P.79.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清末教案》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16-317页。

⑩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1884, p.110.

⑪ S. A. Hunter to the Board, Nov. 11, BFCR, 1885, 19, No.33.

⑫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1890, p.52.

⑬ Gilbert Reid, “An Experience of Missionary Troubles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1892, 23(6), pp.279-285.

返美休假,直到1893年10月回到济南后才真正接管医院^①。

文璧医院是济南第一所西式医院,设3间大病房,每间病房约31平方米,另有三四间小病房,可以容纳30-40名住院病人。但是,现有条件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患者,很多病人只能被安排在周围旅店,一些人甚至必须自备卧具。由于医院尚无专业护理人员,因此能及时住院的患者不超过20人。即便如此,病人还是接踵而至。根据聂会东的报告,1893-1895年期间每年就诊人次均超过5000,1896年更是突破10000人次,住院病人也从1892年的23人升至1896年的205人^②。

文璧医院的正后方是供医学生使用的院落。1890年,首批学生随聂会东一同迁往济南并于当年完成学业。随即,聂氏招收了第二批学生,人数增至7人^③。他花费1年半的时间对新生进行化学、解剖学等方面的教育。1891年底,聂氏回国休假,学生们被送到沂州府,由章嘉理(Charles F. Johnson, 1857-?)医生负责教学。章氏安排他们一周四天进行专业课学习并接受临床实践和外科手术指导,另有两节宗教课^④。聂会东对章氏的课程设置给予高度赞扬,这种相邻地区不同传教医师合作授课的形式,可视为山东现代医学教育“巡回班”(peripatetic class)模式的确立。借助巡回教学,聂氏第二批学生中有5人于1894年顺利毕业。此时,聂氏相继完成两个班级共10人的系统医学教育(第二批次7名学生中有2人中途辍学)。

1894年,聂会东招收了第三批学生,人数仍是7人^⑤。后减至5人,学制4年,一周有四五天的上午在教室内学习,下午在门诊部实习。课程包括化学、生理学、解剖学、药理学、临床实习、手术、产科学、眼科学和皮肤病学等,均采用中文教材。学生在学习期间每个月可以得到2块鹰洋,毕业后需在教会医院或诊所至少服务2年。聂氏试图延续与章嘉理的巡回合作教学模式,但由于章氏所雇佣的几名中国助手出走,导致前往沂州的学生跟随章氏只学习了几个月就返回济南^⑥,这可能是该批次学生在1897年(未满4年)便结束学业的原因^⑦。1898年5月,聂会东再次回国休假,济南的医学班暂停招生。1899年,身处登州的长老会传教士慕维甫(W. F. Seymour, ?-1928)组织了一个7人医学班^⑧,但慕氏于当年6月返回美国。传教站人手短缺,差会决定将结束休假的聂氏临时派驻登州,接管此地包括医学班在内的各项医学工作^⑨。

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对山东境内的基督教会造成巨大冲击,迫使教会在高等教育领域走向联合。山东省内势力最大的两个差会即美北长老会与英国浸礼会,借在芝罘一起避难的机会进行工作探讨,就集中双方资源合作办学达成共识^⑩。这一合作意向促成两个教会于1902年6月13日在青州会谈,会议草拟了联合创办大学的初步计划。后经过英美两个差会总会的反复讨论,双方于1904年2月正

① 关于教会医院,《山东医科大学史志》有如下描述:“1890年,聂会东奉调到济南协助教会工作,在东关华美街(现为兴华街)与洪士提凡夫妇安德逊(女)扩建了女士医院、并建医校,次年竣工。”周申主编:《山东医科大学史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2页。这段描述有多处与史实有出入。洪士提反于1885年离职,聂会东并没有和他共事。文璧医院于1892年8月投入使用,女子医院开业更是迟至1895年4月。James Boyd Neal, *Report of the Chinanfu Medical Work: 1891-1896*,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7, pp.1-3.

② James Boyd Neal, *Report of the Chinanfu Medical Work: 1891-1896*, pp.2-7.

③ James B. Neal to the Board, Oct.4th, BFCR, 1890, 24, No.46.

④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1893, p.69.

⑤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1896, p.75.

⑥ James Boyd Neal, *Report of the Chinanfu Medical Work: 1891-1896*, pp.9-10.

⑦ The Annual Register and Report of the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1912,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G011-267-4270, p.94. 此为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保存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以下引用该档案时简称 UBCHEA.

⑧ W. F. Seymour to the Board, Mar.22, BFCR, 1899, 41, No.11.

⑨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1900, p.77.

⑩ E. W. Burt, *After Sixty Years: The Story of the Church Founded by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in North China*, London: Carey Press, 1937, pp.71-72.

式公布名为《教育工作联合准则》(Basis of Union in Education Work)的文件,同意联合组建3个学院,即设在潍县的文学院、设在青州的神学院以及一所医学院,但医学院校址及运作方式待定^①。其中原因并不难理解。这一时期无论是长老会还是浸礼会,虽然都开展了医学生的培养工作,但均未成为有规模的正规学校。双方差会决定各派3人组建联合教育委员会,继续磋商合作的具体事宜。

1905年联合教育委员会讨论、修订了《教育工作联合准则》,确定医学院落户济南,由浸礼会负责修建,财产权归浸礼会。同年9月,英国浸礼会总会批准了这一修正案,但不承诺提供资金支持医学院建设。美北长老会总部因无须负担建设费用,在1906年1月批准了修订案^②。建设经费未能解决,浸礼会山东差会只好寻求英国圣公会的医学传教辅助委员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Auxiliary)相助,双方成立“联合医学教育委员会”,继续向英国浸礼会总部申请款项。1906年6月,浸礼会总部中国委员会最终决定给予支持,并请求总部向阿辛顿基金申请医学院建筑费^③。1907年2月18日,联合大学董事会在青州召开第三次年度会议,获知阿辛顿基金决定拨款4000英镑作为在济南修建医学院和医院的第一期费用,另有每年568英镑的维持费,连续发放5年。医学院经费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为加快医学院的组成,联合大学董事会通过决议,命聂会东及浸礼会传教士武成献(James R. Watson, 1855-1937)致函山东所有差会,要求他们加盟济南的医学院。董事会同时任命聂为医学院的教员之一^④。从这次会议后刊布的资料封面看,医学院也有了正式的名称 Shantung Union Medical College,但没有载明中文名^⑤。至此,医学院所在地、经费和师资都基本敲定,只差一块合适的地皮。1908年,浸礼会在济南南郊获得一片土地,医学院的建造立即于秋天动工。次年,学院请来浸礼会建筑师佩利姆(G. H. Perriam)主持修筑事宜^⑥。

合办医学院令浸礼会与长老会的合作更加紧密。在医学院建筑落成启用之前,双方继续沿用巡回班模式上课。从在山东开展医学教育的历史来看,英国浸礼会要晚于美北长老会。1891年,武成献在青州招收了一批学生并于次年建立起山东差会的第一个医学堂^⑦,规模与聂会东的医学班不相上下^⑧。据武氏记载,他从1904年10月开始给巡回医学班授课,共13名医学生,其中7人来自长老会,6人来自浸礼会。第一年课程包括基础物理、基础化学、实用化学、药理学、基础生理学和骨科学,“目前他们的学习状况令我十分满意,第二年的课程将交由济南的聂会东医生负责”^⑨。

从1905年10月起,聂会东接手该批学生,指导方式如下:“除农历新年的一个月外,这些学生跟从我学习解剖学和生理学,一周四天,每天两个小时,直到6月中旬。到了第二学期,在上午两个小时教学基础上,下午再拿出一部分时间对他们进行指导……过去一年医疗工作不是特别繁重,让我有充足时间用于教学”^⑩。1906年,学生们仍由聂会东教导,1907年转交邹平的浸礼会巴德顺(T. C. Paterson)医生^⑪。1907年5月,章嘉理休假离开沂州^⑫,后被直接调往济南,所以章氏其实并未直接

① “Basis of Union in Education Work”, *The Chinese Recorder*, 1904, 35(3), p.154.

② J. R. Watson to the Board, Jan.30, BFCR, 1906, 121, No.16.

③ 陈静:《合作与冲突:美国浸礼会与美北长老会在齐鲁大学创建初期的博弈》,《基督宗教研究》2017年第2期。

④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1907, UBCHEA, RG011-267-4269, pp.7-9.

⑤ 1910年差会发布的文件确定医学院的中文名称是“医道学堂”。“医道学堂”常称为“共合医道学堂”,应该是 Union Medical College 的翻译。齐鲁大学及各个学院的中英文名称在不同时期多有变化,已有学者作过周详、准确的考证。参见郭大松:《齐鲁大学文理医三学院渊源及中英文名称考》,《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⑥ *Annual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1910, p.66.

⑦ *Annual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1893, p.48.

⑧ James Boyd Neal, “Medical Teaching in China”,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97, 11(2), p.91.

⑨ *Annual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1905, p.132; *Annual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1906, pp.64-65.

⑩ Personal Report of James Boyd Neal 1906, BFCR, 1906, 131 (Part 1).

⑪ “Medical Mission Statistics.1907”,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1908, 22(3).

⑫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1908, p.136.

参与这批学生的教学。不过,在1900-1906年,章嘉理与聂会东曾合力推进一个11人的医学班。该班由章氏于1900年在沂州府独自招收,最初15人,旋即因义和团运动停课。1901-1902年长老会传教士陆续返回山东内地,该班在1902年春季复课,但人数减至11人^①。这一批次的学生由聂、章二人共同指导,于1906年完成学业^②。1907年聂会东返美休假,次年9月回到中国,10月被董事会任命为医学院院长,而文璧医院则交给章嘉理负责^③。

在医学院建筑完工之前,聂会东便于1909年9月的《博医会报》上发文介绍学院背景和成立过程。据其描述,即将完工的医学院主楼共三层,配备宽敞的解剖学、生理学、组织学和病理学教室及实验室,另有研究药材和实用药学的专用设备。聂氏因此自豪地宣称:“这些现代化的设施为医学生内、外科的实习提供了便利。”对于未来,他更是充满自信,期待山东甚至邻近省份的其他教会也参与到这个联合学校,共同培养中国医生。聂氏还公布了医学院新的课程计划:学制6年,第一年在潍县广文学堂学习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课程,后面5年在济南学习医学专业。师资包括聂会东、魏德模(Freiherr Von Werthern)^④、武成献、巴德顺、章嘉理5名传教士医生以及数位具备相当能力的中国助手,全部使用中文授课。文中还附有校园规划图与医学院主楼景观图^⑤。这篇文章更像是一则医学院的招生广告。

1910年2月2日,大学委员会(University Council)^⑥第六次年度会议商讨医学院师资、设施、学生等问题,以迎接学院的开学。美北长老会增派徐伟烈(William M. Schultz, 1878-1957)和罗嘉礼(Charles K. Roys, 1875-1920)加入医学院。对于已学习3年的学生,他们可以选择完成班级开课时的原定课程,但不能得到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或者选择进入医学院三年级课程,进行两年学习以及一年带薪实习,在完成6年学业后方可获得医学院毕业证书。关于是否招收女性医学生,学院教师认为时机尚未成熟^⑦。同年,聂会东向大学委员会提交了医学院年度报告^⑧。

1910年初,尽管医学院主建筑尚未竣工,但学生们已可以入校上课。武成献于1907年招收的巡回班学生并入医学院四年级,另有9名一年级新生。1910年3月11日,新学院正式迎来2个年级共20名学生^⑨。据齐鲁大学档案记载,医学院落成前共有7个批次38名学生被列入齐鲁大学毕业生名单中,详情见下表:

早期齐鲁大学医科学生统计(1887-1911年)

入学时间	招收人数	毕业时间	毕业人数	指导教师	上课地点	备注
1887年	5	1890年	3	聂会东	登州 济南	这3名学生在齐鲁大学档案中列为首届医学院毕业生
1890年	7	1894年	3	聂会东、章嘉理	济南 沂州	
1894年	7	1897年	3	聂会东、章嘉理	济南 沂州	
1899年	7	1901年	6	慕维甫、聂会东	登州 济南	慕维甫招收,聂会东起初在登州指导这批学生,义和团运动后将他们带至济南

① “Hospital Reports”,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905, 19(5), pp.209-210.

②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1907, p.131.

③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1910, p.137.

④ 魏德模(Freiherr Von Werthern),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作为浸礼会在医学院的代表,他在1908年被派往济南。

⑤ James Boyd Neal, “The Union Medical College in Tsinan”,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1909, 23(5), pp.316-318.

⑥ 大学委员会是由原校董会改组而成,是大学的管理机构,委员会由各联合差会选派并为差会负责。

⑦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1910, UBCHEA, RG011-267-4269, pp.23-24.

⑧ 据笔者查阅的亚洲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这份资料是医学院提交的第一份报告。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1910, UBCHEA, RG011-267-4269, pp.50-54.

⑨ James B. Neal to the Board, Mar. 28th, BFCR, 1910, 125, No.48.

续表

入学时间	招收人数	毕业时间	毕业人数	指导教师	上课地点	备注
1900年	15	1906年	11	章嘉理、聂会东	沂州 济南	章嘉理招收,后因义和团运动停课,1902年复课
1904年	13	1908年	5	武成献、聂会东、 巴德顺	青州 济南 邹平	浸礼会与长老会达成合作后第一批“巡回班”学生
1907年	18	1911年	7	武成献、聂会东等	青州 济南	1910年并入医道学堂四年级

医学院成立,新建筑启用,按教会传统应举行盛大的落成典礼。1911年1月21日,大学委员会决定,典礼定于当年4月17日举行,也就是基督教复活节后的周一,连续3天^①。

17日上午,包括时任山东巡抚孙宝琦在内的一众官员、嘉宾陆续到场。据说当天共来了“37顶轿子,另有不计其数的轿夫、骑马随从、警察等等”。聂会东带领来访者参观医学院的各个建筑,浸礼会传教士郝复兰(Frank Harmon)介绍了学院现状和办学宗旨。孙宝琦向医学院捐银1000两,感谢传教士在年初防控鼠疫疫情时的贡献^②,称赞西医疾病预防及公共卫生知识的重要性,并表示中国政府对此已有深刻认识^③。18日和19日分别接待中外妇女、信徒及社会公众,一度热闹非凡,盛况空前。

时移势易,传教士们敏锐地感知到了当地官员的变化。在孙宝琦的答谢宴会上,章嘉理直言,与3千万人的统治者握手,听着他的致谢演说,“让我们当中有些人感觉这不是真的……回想起过去25年的经历,那时我们就住在这座城市中国人的房子里,走到街上总会听到公开的辱骂声,要想见山东巡抚就像见中国皇帝一样(困难)。真的是‘时代变了’”^④。从此,医学院进入发展的新阶段。

三、聂会东对医学教育体系的探索与贡献

(一)教育体系的创建

1887年,聂会东在登州招收第一批学生时就开始思考如何在中国环境下培养医学生。1890年,第一批学生即将结业之际,他应邀赴上海参加第一届中华博医会发表演讲,首次提出医学教育体系的构想,后以《论医学生培养及前景》为题刊登于《博医会报》^⑤。他谈了6方面的问题,这对我们理解聂会东的医学教育体系至关重要,所以这里作较为详细的阐述。

第一,结合自己的授课实践,聂会东认为,医学教学至少需要4年,如果再加入物理、历史、地理等基础课程,学制甚至应延长至5年。山东长老会采纳了他的4年培养方案,学生每年至少保证7个月的上课时间,其余5个月应去照顾病人、接受临床教学^⑥。

第二,尽管当时教会内用英语教授西方知识的呼声很大,但聂会东与文会馆创始人狄考文的思路一样,从中国人的实际需要出发,坚持使用中文教学。他说:“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建立起一套合适的

①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1911, UBCHEA, RG011-267-4269, II, XIX.

② 1911年1-2月,医学院在济南东郊、西郊建立隔离医院,对鼠疫的防控起到重要作用。“The Plague”, *The North-China Herald*, 1911年2月10日,第298页;“The Plague”, *The North-China Herald*, 1911, 24, p.418;“The Plague”, *The North-China Herald*, 1911年3月10日,第554页。

③ Robert Coventry Forsyth,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pp.324-325.

④ Robert Coventry Forsyth,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 p.326.

⑤ Jas. B. Neal, “Training of Medical Students and Their Prospects of Success”,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90, 4(2), pp.129-135.

⑥ Jas. B. Neal, “Training of Medical Students and Their Prospects of Success”,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90, 4(2), p.130.

医学术语,构建本土的医学教科书,让中国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就可以获得医学知识,就像用英文一样完美。”^①在教学方法上,聂会东认为应该让学生更多定期背诵(recitations),而非通过讲座(lectures)方式,因为前者效率明显更高。因此,他强调传教士认真编译中文教材的重要性,尤其是印刷出来供他人教学的教科书,必须要用一流汉语用心去做,“这样才不会制造出文字粗鄙的书本,让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无法容忍,让我们和我们的事业蒙羞”^②。

第三,聂会东希望中国医学生的课程与美国医学院的课程一样全面、综合,以便日后的就业。当然,他也认识到中国目前达不到美国那样的教学和实验条件,因此他强调至少要有2年的时间用于解剖学、病理学、化学、药理学等基础课程的学习;鼓励多开展实践教学,特别是在外科、皮肤病、眼科等前景广阔的领域,中国学生临床学习的机会要比美国学生好得多,能从中获得更丰富的实践知识,而美国学生缺乏独立给病人检查的机会^③。

第四,为解决对学生进行多样化的教学和指导难题,聂会东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合作教学,同一差会不同传教点的医生,或者同一省份不同差会的医生相互合作。聂氏强调:“一个人无论他多么优秀,或他竭尽全力为学生提供全面的训练,他在兼顾医疗工作的同时不可能完成所有的教学工作。”他认为,学科互相补充是必要的;另外,这种多人联合教学也能激励学生思想活跃,独立思考^④。

第五,聂会东提出培养学生不仅仅是为治病救人,还应有更高的目标,即让学生成为基督徒,帮助同胞成为“高尚的有价值的人”。但他并不主张在医学课程上加入神学培训的内容,而注重在日常工作中潜移默化,给予基督教元素的影响。他不赞成把学生单纯培养成外国医师的助手,而是希望他们以医生的身份向中国人传播福音。^⑤

第六,聂氏表达了对培养中国医学生的信心,尽管这时他在登州只培养了5名学生。

聂会东关于医学教育的构想在许多方面是超前的。事实上,这届大会上仍有为数不少的传教士对是否应当培训中国医学生心存疑虑。他们认为,中国人尚不能充分理解和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这可能导致受过西医教育的本土学生完成学业后难以谋生^⑥。此时,聂氏即将完成对首批学生的教导,且已初步形成自己的医学生培养体系。15年后即1905年,他的联合办学设想成为第二届博医会大会讨论的焦点。接替聂会东出任新一届博医会主席的司督阁(Dugald Christie, 1855-1936)感叹,那些靠一两个传教士苦苦支撑、孤立的教会医学院校,“难道不是在白白耗费精力吗”?^⑦伦敦会传教士纪立生(Thomas Gillison, 1859-1937)表示,目前当务之急是集一定区域内各差会之力共同办学,以保证教学质量,切实提高中国医学生的素质,使他们成为真正合格的医生^⑧。聂会东因此提议,应敦促在华的各基督教会尽最大努力建设联合的医学院,这一提议最后获得一致通过^⑨。聂氏早年的设想终于成为医学传教士这一群体的共识。

在其后20年的医学教育生涯中,聂会东几乎完全践行了上述几点。当然,他也根据实践不断完

① Jas. B. Neal, “Training of Medical Students and Their Prospects of Success”,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90, 4(2), p.131.

② Jas. B. Neal, “Training of Medical Students and Their Prospects of Success”,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90, 4(2), p.132.

③ Jas. B. Neal, “Training of Medical Students and Their Prospects of Success”,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90, 4(2), p.133.

④ Jas. B. Neal, “Training of Medical Students and Their Prospects of Success”,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90, 4(2), pp.133-134.

⑤ Jas. B. Neal, “Training of Medical Students and Their Prospects of Success”,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90, 4(2), pp.134-135.

⑥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90, 4(2), pp.157-158.

⑦ Dugald Christie, “President’s Address”,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905, 19(2), pp.48-49.

⑧ Thomas Gillison, “The Training of Medical Students in Medical Mission Colleges”,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905, 19(3), pp.98-100.

⑨ “The Conference of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905, 19(2), p.39.

善这个体系。如在学制方面,随着教学条件的改善,特别是医学院成立后,他把学制从4年改为6年,加强基础学科,延长实习时间。又如关于联合教学,流动的不是传教士医生,而是学生以巡回班的方式。在医学院于济南落成之前,这是医学教育最切实可行的方法。

聂会东很早就发现中国学生在学习方面的问题。比如与美国学生相比,中国学生缺乏热情和主动性。他指出:“中国学生在所有事情上都等着老师去指导,显然无法为自己规划工作或独立思考”^①;中国学生“在出勤和完成日常工作方面表现十分出色”,但“对自己努力学习的东西很难产生热情,也很难启发他们提出有质量的问题”,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临床实践,他们都只是满足于老师教授的内容^②。因此,在1910年2月的第四届博医会大会上,他专门就此发表了题为《我们应如何激发医学生的科学兴趣》的演讲,提出4点建议:(1)对每一个学生进行全面的实验方法训练;(2)应该放手让学生承担更多的临床工作,包括手术和术后恢复等,让中国学生更加自信;(3)建设医学阅览室,丰富中文医学杂志;(4)教师自身要保持对科学的热情,从事顶尖的科学工作^③。聂氏提出的问题与主要对策,在今天看来,也仍有建设性价值。

(二)中文教材的编译

中文教学以及与此相关的中文教科书、中文医学名词术语的统一,不仅在聂会东的医学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更是他对齐鲁乃至全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巨大贡献,值得一提。

在早期的教学工作中,缺乏合适的中文教材一度令聂会东头痛不已。1896年,聂氏在《博医会报》上直言不讳地评论当时流行的几种医学教科书。他说:“除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的教材外——事实上其内容多已过时——全中国只有广东的嘉约翰认真编写过一套医学教科书。”^④在他看来,嘉氏教材同样存在问题。他认为,《体用十章》的文法艰涩难懂且有不少错误,《外科手术手册》(原名《割症全书》)的编排不甚合理,《内科全书》与《眼科撮要》亟待更新,而德贞(John Dudgeon, 1837-1901)的《全体通考》书价昂贵,令中国学生难以负担。据此,聂会东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填补生理学、治疗学、皮肤病学、产科学等教材的空白,并将售价控制在合理区间。此外,他着重提到,一本中文教科书的出炉要反复修订,其内容必须经过师生课堂互动,将其中最适合教学的内容加以提炼,然后方能编辑成书^⑤。

在呼吁新教材出版的同时,聂会东以身作则,于1895-1898年间先后翻译出版《化学辨质》《眼科证治》《皮肤证治》3本书。其中,《眼科证治》一书的底本为1893年出版的 *A Text-Book of Ophthalmology*,有研究者称赞此书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教材之一^⑥。该书作者威廉·诺里斯(William F. Norris)和查尔斯·奥利弗(Charles A. Oliver)均是威尔斯眼科医院(Wills Eye Hospital)的外科医生,而聂会东首次返美休假,即1892-1893年间,特意花了几个月时间前往威尔斯眼科医院和宾大医学院进修眼科学的课程^⑦。这个时间正值 *A Text-Book of Ophthalmology* 面世前,聂氏有机会了解到这部书的内容及成书过程,这或许也是为何该书出版仅1年多,聂会东便能成功将之译成中文的重要原因。

除介绍眼科学的前沿知识,聂氏翻译《眼科证治》的另一目的是希望推动中国医学名词术语的统

① Jas. B. Neal, “Training of Medical Students and Their Prospects of Success”,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90, 4(2), p.133.

② James Boyd Neal, “How Can We Stimulate Scientific Interest in Medical Students?”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1910, 24(6), p.420.

③ James Boyd Neal, “How Can We Stimulate Scientific Interest in Medical Students?”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1910, 24(6), pp.421-423.

④ James B. Neal, “Medical Text-books in Chinese”,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96, 10(1), pp.57-58.

⑤ James B. Neal, “Medical Text-books in Chinese”,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96, 10(1), p.58.

⑥ W.C. Frayer, “William Fisher Norris: A Philadelphia ophthalmologist”, *Documenta Ophthalmologica*, 1995, 89, pp.55-56.

⑦ *Obituary Record of Graduates of Yale University*, 1924-1925, 1925, p.1335.

一工作^①。自19世纪中叶以来,来华传教士陆续将一些西医书籍译为中文,但由于西方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分属不同的知识体系,所以在译述外文书籍时往往难以找到恰当对应的中文词汇;加之当时译者多各自为政、少有交流,不同译作对同一医学术语常采用不同的译名,从而造成大量的“混名”问题。1890年,首届博医会大会决定成立医学名词委员会,但多数委员忙于行医传教,工作进展缓慢^②。名词委员会不得不考虑更新人员,因聂会东在《眼科证治》中所提构想正合其意,于是他被吸纳进改组后的委员会,成为推动统一医学术语的干将。

1901年初,在上海躲避义和团运动的高似兰(P. B. Cousland, 1860-1930)、惠亨通(H. T. Whitney, 1849-1924)、师图尔(G. A. Stuart, 1859-1911)和聂会东共4位名词委员会成员召开了一次长达6个星期的会议,对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等领域的名词术语进行深入讨论,最终确立若干条医学名词命名规则,并将其公之于众^③。1903年,升任博医会主席的聂会东连续撰文,呼吁协会成员对名词委员会的工作建言献策^④。1905年,第二届博医会大会在上海召开,聂氏主持会议,对博医会未来几年的工作提出建议,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出版术语统一的医科丛书^⑤。高似兰代表名词委员会向大会重申医学名词的审定原则,后以此为基础编写了《高氏医学辞汇》,作为翻译和出版医科书籍的准绳。在聂、高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来华医学传教士内部终于就医学名词的统一达成共识。

在该届大会上,聂会东当选为新增设的出版委员会主席^⑥。在他的运营下,出版委员会成立不足2年便有7本按新标准术语出版的中文医学教科书面世^⑦。1909年,委员会共筹集到11000鹰洋作为图书出版资金。至1916年,委员会已推出近40部教材,涉及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眼科、皮肤科、药理学、解剖学、生理学等各个领域^⑧。

聂会东多年来对联合办学与中文授课的追求为齐鲁大学医学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支持下的中华医学基金会(罗氏驻华医社),经过多年调查和研究,决定投资支持中国的医学教育,重点建设北京协和医学院,以期通过英语授课开展高标准的教学工作。代表众多教会医学院的中华博医会认为,这可能会严重影响中文医学教育的发展,因此建议基金会至少支持1所以中文教学的医科院系达到一流水准,并推荐了济南的医学院^⑨。其之所以能脱颖而出,首先是因为聂会东等人二十多年来坚持中文教学,成绩斐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医学院堪称教会合作办学的典范,符合当时博医会整合教会医学教育资源的目标。

因齐鲁大学医学院无法满足“英语授课”的限定条件,洛克菲勒基金会不能直接给予支持。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准备扩建旧协和医学院(堂),中文教学的三个低年级班学生需要安置而齐鲁大学医学院愿意接收,因此基金会决定资助齐鲁大学5万美元,用于医学院必要的扩建和设备的购买,并在之后分5年拨给10万美元的维持费^⑩。1916年10月,65名协和学生从北京迁往济南。此后若干年内,来自洛

① 聂会东(James B. Neal)、尚宝臣:《眼科证治》,上海:美华书馆,1895年,“序”,第1页。

② 张大庆:《早期医学名词统一工作:博医会的努力和影响》,《中华医史杂志》1994年第1期。

③ 详见“Work of the Nomenclature Committee”,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901, 15(2), pp.151-155; G. A. Stuart, “Scientific Terminology”, *The Chinese Recorder*, 1901, 32(6), pp.305-306.

④ James B. Neal, “President’s Letter”,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903, 17(4), pp.171-172; James B. Neal, “President’s Letter”,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904, 18(2), p.87.

⑤ James B. Neal, “The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905, 19(2), p.65.

⑥ “The Conference of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905, 19(2), pp.43-44.

⑦ James B. Neal, “From the Publication Committee”,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907, 21(2), pp.85-86.

⑧ 详见史如松:《博医会研究:中国近代西医界职业活动模式的形成》,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53-57页。

⑨ Harold Balme, *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 A Study in Medical Missionary Development*, London: United Council for Missionary Education, 1921, p.124.

⑩ Roger S. Greene, “The China Medical Board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E. C. Lobenstine (eds.),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6, Shanghai: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6, p.322.

克菲勒基金会的经费始终是医学院收入的大宗^①,为医学院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四、结语

在山东现代医学教育缓慢而又艰难的发展历程中,聂会东居功甚伟。自 1887 年他于登州教会诊所招收第一批 5 名学生至 1911 年 7 名学生从济南医学院毕业,聂氏及其同事在 24 年中共培养了 38 名毕业生。学生培养规模并不大,但却是山东现代医学教育的首批成果。由于师资、场所、实验条件等的限制,加之传教医师所承担的繁重医疗工作,每次招生人数均很有限。聂氏因地制宜,灵活创设巡回班培养模式。直到 1910 年医学院建筑落成,长老会与浸礼会陆续增派师资,这种情况才发生根本改变。学院具备了每年招生的条件,巡回班模式才过渡到更为系统、正规的学院体制,齐鲁医学教育由此发端。

在中华博医会的推动下,金陵大学医学系与汉口大同医学校于 1917 年相继并入齐鲁大学。此时博医会出版委员会 8 名委员中的 4 人聚首齐鲁大学医学院^②,齐鲁大学一跃成为教科书编译工作的前沿阵地,以中文教学的教会医科院系几乎全部选用了来自齐鲁大学的教材^③。这些均表明,聂会东在中华博医会和齐鲁大学任职期间参与或领导的名词术语统一、出版等工作,对现代医学教育乃至整个科学技术教育、传播和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文理学院与神学院于 1917 年分别从潍县和青州迁至济南,齐鲁大学实现同地办学。在文理、神、医三个学院中,医学院本是历史最短,师资、学生、校友最少的学院,但由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中华博医会的支持,医学院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其影响力迅速超越文理学院,自 20 世纪 20 年代便成为齐鲁大学的招牌学院,一枝独秀。这一过程看似偶然或幸运,但追根溯源,均可从聂会东近四十年的努力中找到答案。今天,齐鲁医学人将聂氏定位为“山东现代医学事业、齐鲁大学医科和‘齐鲁医学’品牌的主要创立者”^④,毫不为过。我们的确应该铭记这位把一生都奉献给中国的美国人。

James Neal and the Origin of Cheeloo Medical Education

Liu Jiafeng Ye Dashe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R.China)

Abstract: James Boyd Neal, who came to China in 1883, served in Shandong for almost 40 years by curing diseases and training physicians. In collaboration with missionaries of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Neal pioneered a new teaching mode of “peripatetic class” for medical education; he insisted on teaching in Chinese and established a standard modern medical education system for decades’ practice. Neal also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compile Chinese medical text-books and uniform medical nomenclature. As the founder of Cheeloo College of Medicine and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Neal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world-renowned Cheeloo Medicine.

Keywords: James Boyd Neal; Medical education; Cheeloo University; Cheeloo Medicine

[责任编辑:以沫]

① 刘家峰:《齐鲁大学经费来源与学校发展:1904-1952》,章开沅、马敏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9页。
② 分别是聂会东、纪立生、孟合理(P. L. McAll)、施尔德(R. T. Shields)。“Joint Medical Conference, Canton”,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1917, 31(2), p.144.
③ 芳卫廉:《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1950》,刘家峰译,珠海:珠海出版社,2005年,第146页。另见“Cheeloo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Jan. 1931”, UBCHEA, RG011-244-3998, pp.4-5.
④ 吕军、曹英娟编译:《聂会东文集》,“序二”,第5页。